

第一章 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第一节 英国贩毒与林则徐禁烟

进入 19 世纪后 大清王朝开始从自己的巅峰跌落下来 日益走向衰败。新兴的资本主义英国，正想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市场。可是当时英国的王牌产品，如机制棉布、毛织呢绒等，因为售价过高，始终敌不过中国本地的产品。而中国本身的特产品，如丝、茶、漆器、瓷器等等，由于品质优良，却为西方所欢迎。特别是茶 自 18 世纪后半叶以来，日益成为英国人民所普遍欢迎的饮料。英商在经销过程中，为了取得支付的平衡，必须运来大批的白银，主要是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这种贸易状况，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需要是尖锐对立的。于是，英国商人，首先是设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利用鸦片这种成本很低而售价极高的特殊商品，取代银货，弥补对华贸易中的赤字。

鸦片 (opium)，又译作阿片，阿芙蓉，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果实的汁液提炼制成的一种毒品，因为有镇静、止泻、止痛作用，自明代以来，一直作为药材征税少量进口。17 世纪吸食鸦片的方法由南洋传入中国，此法较吞服更易上瘾，对人体造成很大危害。1729 年（清雍正七年），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吸食鸦片。1796 年（嘉庆元年），更下诏停止鸦片征税，严禁鸦片输入，鸦片贸易已成为非法。

但英国坚持进行可耻的鸦片贸易。他们利用鸦片贸易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换取中国的茶叶、生丝，又利用印度农民种植鸦片

的收入，使英国工业品在印度市场上增加了销路。在英（棉纺织品）印（鸦片）中（茶、丝）的三角贸易中，鸦片贸易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只要这一环节维持不断，英国资产阶级腰包中的利润就会越来越多。

在中国政府对鸦片采取严禁的政策后，英国商人便以武装走私的方式来推进鸦片贸易。为此他们先是在澳门、黄埔设立堆栈，最后则在珠江口附近的伶仃洋建立走私据点，在伶仃岛停泊固定的鸦片趸船，并由兵船加以保护。据估计，在 1815 年到 1819 年，每年走私入口的各类鸦片达 4000 余箱，1820 年，已上升至 7000 至 10000 余箱。1834 年东印度公司被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完全转到私人企业手里。这些私人企业干得更为起劲：1835 至 1838 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激增至每年 35000 余箱。鸦片走私的结果，不仅弥补了对华正常贸易中的逆差，且年年有余。走私鸦片成了掠夺中国财富的一种手段。据估计，自 1800 年（嘉庆五年）到 1838 年的 39 年间，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鸦片贩子，已从中国掠夺了价值三四亿银元的财富。

由于中国一再禁止鸦片入口，英国政府于 1832 年曾专门就鸦片税问题进行过调查。英国议会的报告中说：孟加拉的鸦片专卖每年供给政府数达 981293 金磅的收入。鸦片税是按成本 301.75% 的税率征收的。在目前印度财政收入的情况下，要抛弃如此重要的一种税收，看来是不适当的。鸦片税是这样的一种税，它主要由外国消费者来负担。整个说来，它比之任何可能代替它的税，更不易遭人反对。

于是鸦片贸易便由英国政府的默许变为公开的认可，而英国烟贩的走私活动益发成为英国政府包庇的对象。1834 年，在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英国政府改由外交部直接派出驻华商务监督，指导对华贸易。

鸦片的泛滥，在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首先是吸食鸦片

成风，烟民的队伍不断扩大。据 1835 年的估计，全国吸食鸦片者已达到 200 万人以上。吸食者已不限于一班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也不仅是士绅平民，甚至包括了达官贵人和军队官兵。中国当时著名的思想家之一魏源曾说过：今天鸦片已在整个中国蔓延，它不仅使人的形骸枯槁，蛊惑人的心志，还会伤害人的身家性命，实在是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的大患。而当时的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也评论说：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身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

鸦片泛滥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它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贵钱贱，过去一两白银换铜钱 1000 文左右，1832 年涨到 1300 多文，1838 年竟涨到 1600 多文。银两的短缺造成了商业的萧条。广州方面，洋行竞相倒闭。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苏州、汉口等地，据林则徐的调查，也是各种货物销路皆疲。银贵钱贱直接威胁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农民和手工业者仅有的少量产品零星出售，只能换回铜钱。但他们在交纳各种捐税时按规定却要折合成银两。白银的增值意味着农民在事实上必须交纳更多的地租和赋税，他们所受的剥削愈益加重了。

鸦片的泛滥，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由于大量白银外流，银价上涨，各地税收困难，国库储备越来越少，清政府的财政也陷入了困境。官吏和兵丁吸食鸦片，从鸦片走私中收受贿赂，使得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败，军队更加丧失战斗力。据当时人估计，京官中大约有十之一二的人吸食鸦片，地方官中有十之二三，而幕僚、长随、差役中吸食者的比例就更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中国人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吏体系之心

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由于鸦片泛滥已经成了危及整个国计民生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清朝最高统治当局苦苦寻求解决的良策。

1836年，曾长期在广东任职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请求弛禁，也就是提倡鸦片贸易合法化。他认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不如允许外国输入鸦片，照药材纳税，政府可以增加税收；而鸦片进口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可以避免白银外流。同时，提倡内地种植鸦片，以抵消外国鸦片的进口。对一般百姓吸食鸦片的，因为都是些游堕无志、无足轻重的人，可以网开一面，只禁止官员、士大夫、兵丁吸食就行了。许乃济的主张，得到了广东方面一些官员士绅的支持，也得到了英国鸦片贩子们的赞同，但遭到相当多的官员们的反对和批驳。道光帝也不首肯。

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详细申述了鸦片泛滥的种种严重后果，并提出：如欲从根本上肃清烟毒，必须重治吸食。因为没有吸食的人，自然没有贩卖；没有贩卖，则外夷的烟也就不会来了。他请求皇帝严降谕旨，给吸食鸦片者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后仍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应置之重刑，论以死罪，官吏则加等治罪，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又提出五家互保，举发者有奖，包庇者治罪。这一最彻底的禁烟主张，在清朝统治阶层内部引起了激烈的反响。道光帝下令各地大员们复议。结果，仅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澎等少数人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其余的人则反对重治吸食，但所有的奏章都一致主张加强对贩烟、售烟的打击力度。林则徐更雷厉风行地在湖北和湖南两地收缴烟土、烟枪，强制戒绝吸食。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痛切地指出：鸦片已流毒于天下，倘若仍不予以正视，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

之银。

道光帝在鸦片输入势将造成军队瓦解、财源枯竭的严重威胁下，终于下定了决心。10月，他下令各省严禁鸦片，务期净尽根除，并立即将许乃济降级，勒令退休。全国掀起了禁烟运动的热潮。11月，道光帝命令林则徐进京陛见。12月26日林则徐到达北京后，道光帝接连在八天中八次召见。12月31日第五次召见后，即正式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1839年1月8日，林则徐离京赴任。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做过浙江道员、江苏巡抚，以公正清廉、办事认真著称。1839年3月，他一到达广州，便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一起整顿海防，严拿烟贩，惩处受贿卖放的水师官弁。与此同时，他还通知外国商人报告存烟数目，听候办理，并要求出具甘结，声明以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毅然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中国厉行禁烟，严重打击了外国烟贩们的利益。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亲自出面破坏林则徐的禁烟措施。他一面下令珠江口外的趸船逃逸，并作战斗准备；一面抗议广州设防，并准备迫令英侨撤离广州。林则徐按照“违抗封舱”旧例，下令停止贸易，派兵严密封锁洋馆，撤退仆役，断绝趸船与洋馆往来交通。义律便改变手法，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命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为联合美国一致对华，义律也劝美国人缴烟，声明烟价同样由英国政府负责赔偿。他这样做，目的是要把中国处理不法英商的问题，扩大为中英两国间的问题，为英国政府侵略中国的战争制造借口。

从1839年4月下旬到5月中旬，英国、港脚（印度）、美国商人陆续呈缴了囤集在伶仃岛趸船及其他地方的19000多箱鸦

片，计 237 万余斤。林则徐对外商鸦片的移交工作进行了周密的督察。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就住在船上。6 月 3 日，在林则徐主持下，于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所缴烟土。销烟工作前后进行了 20 多天。参观销烟的外国人一开始认为中国人不会销毁一两鸦片的，即使销毁，大部分鸦片也一定会被偷走。但当他们参观以后，也不得不佩服林则徐办事的认真与彻底。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记载说：我们反复考察销烟的每一步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像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加忠实了。

虎门销烟的壮举，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近半个世纪越演越烈的鸦片祸害，终于暂时地局部地被阻止了。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一幅大型浮雕，就是“六三”虎门销烟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第二节 战争的曲折进程

然而虎门销烟的壮举并没有丝毫触动惟利是图的英国烟贩们的羞耻心。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些鸦片贩子们始终密切注视着中国高层自 1836 年到 1838 年间有关鸦片的辩论，并且确信鸦片贸易即将在中国合法化。为此他们不仅囤积了大批存货，甚至还向印度的鸦片种植者追加了订货。当 1838 年中国的严厉禁烟开始生效之时，他们才发现自己手中囤积的鸦片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他们将大量囤积的实际上已无法脱手的毒品交给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而再由这位英国政府的代表将其交给林则徐销化入海时，他们根本不是感到羞耻，而是庆幸可以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确保自己得到财政补偿。大鸦片贩马地臣称颂义律缴烟的命令为远大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为，因为中国人因此而掉进了要直接对英国政府负责的陷阱。交出鸦片的英国商人们还按每箱一元的标

准集资作为活动经费，汇回国内让大鸦片贩子查顿向英国官员和各大报纸进行游说，要求英国政府积极过问。

鸦片贩子们走私毒品，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被没收，为什么要由英国政府保证赔偿？英国政府又拿什么来赔偿鸦片贩子们的损失？很显然，他们是要发动侵略战争，勒索赔款，掠夺中国。1839年4月3日，也就是缴烟事件刚刚发生后，义律在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报告书中，诬蔑中国的禁烟是所谓“不可饶恕的暴行”，是“侵犯英国生命财产、侵犯英王尊严”的行为，并且建议：英国唯有实行丝毫不露声色、迅雷不及掩耳的沉重打击，才是对付中国人的最恰当的方式。在以后的报告中，义律多次重复了这类战争叫嚣。

英国早有向远东地区扩张的野心，1793年和1816年曾两次派特使到中国，提出建立外交关系，增开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等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鸦片战争前的十年间，英国曾多次派船在中国沿海测量航道，绘制地图，调查军事设施和经济情况。

1839年8月，林则徐命令外商缴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沸腾起来。一些英国市镇的商会、工商联合会等组织和个人纷纷向英国政府提出各种建议和要求，发出一片战争喧嚣。他们认为：中国的禁烟，给了英国一个极好的战争机会，可以使英国乘战胜之余威，提出各种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不能轻易放过。他们鼓吹：“对付中国和对付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果敢地施用武力，可以得到意外的效果。”政府方面，巴麦尊在接到义律的正式报告后也立即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

英国内阁于10月1日决定发动侵华战争，派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巴麦尊根据鸦片贩子查顿等人提供的情报和方案，在致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的训令中，详尽地指示了封锁广州及中

国沿海口岸、占领舟山、要求赔偿、割让岛屿、订立条约等侵华作战和外交的方针。英国政府对于战争的决定和部署，一直严守秘密。迟至 1840 年 4 月，出兵中国的决定才在议会辩论，以 271 比 262 票的微弱多数通过。

6 月 21 日起，英国“东方远征军”陆续到达广东珠江口外，共拥有 16 艘战舰，540 门火炮，4 艘武装汽船，28 艘运输舰，以及 4000 人的地面部队。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此时林则徐已由钦差大臣改任两广总督。自虎门销烟后，他一方面继续不懈地查禁鸦片，另一方面也积极进行备战。在义律的指使下，英商拒绝按中国的法律保证不再从事任何鸦片交易。林则徐便将他们进一步逐出澳门。义律以香港岛为基地，英船也聚集在九龙尖沙咀一带，继续进行鸦片走私的罪恶勾当。林则徐则在广州的水路加强了防御，为要塞新购置了大炮，用巨链封锁了航道，并开始大力整顿水陆官兵。他积极倡导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并从渔民、蛋户、盐工中大量招募水勇。他还公开号召：“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广东方面曾多次挫败了义律的武装挑衅。但无论是林则徐还是清朝中央政府，都没有意识到一场大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英国远征军到达广东外海后，并没有进攻广州方面的准备，只是按计划留下 4 艘舰只封锁港湾的进出口，而将主力驶向北方。7 月，英国人以两艘舰只封锁宁波，并攻占了浙江外海的定海（今舟山市），以阻断通往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海上交通。8 月，舰队抵达天津白河口，投递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宣称如果不能满足照会中提出的所有要求，必将一直和中国打下去。

定海失陷和英军北驶的消息，使得清政府大为震动。道光帝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奔赴天津海口，以便对英军舰队进行“羁縻”（笼络使不生异心）琦善亲眼看到英军“船坚炮利”，认为无法战

胜，况且即使今年打胜了，明年还会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因而主张采用“好言相诱”。在谈判中，他向英国侵略者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持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保证要“重治其罪”。要求英军退返广东，“听候钦派大臣驰往广州，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英军见已实现以武力要挟清政府谈判的目标，在对中国北方沿海进行了系统侦察，搜集了大量情报后，便于 9 月 14 日南下广东。

北方的险情消除了。道光帝还以为是自己的羁縻政策发生了效果，他后来在一段朱批中得意地写道：“好在彼（指英国人）志在通商，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他于 9 月 16 日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与英人继续谈判。接着，又将林则徐、邓廷桢（已改任闽浙总督）革职，其罪名是“误国病民，办理不善”。在道光帝羁縻政策指导下，两江总督伊里布与英军签订了浙江停战协定。这使得已为疾疫流行和中国军民的袭击所困扰的定海英军免除了后顾之忧。

琦善进京请训后南下，于 11 月底到达广州。12 月开始与英方就赔偿烟价、割让岛屿或增开口岸以及交还定海等问题进行谈判。除割让岛屿因事关重大不敢擅作主张外，他对赔偿烟价和开放口岸等条件都一一加以承认。为讨好英方，他还取消了林则徐的种种措施，自动撤防，解散水勇。但他这种讨好姿态只是涣散了自己的军心士气和助长了英方的嚣张气焰。接替懿律担任英方全权代表的义律，为进一步对琦善施加压力，于 1841 年 1 月初发动突然袭击，攻占了大角、沙角炮台。守台官兵 600 余人阵亡。1 月 20 日，义律单方面宣布已达成协议，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 600 万元、恢复广州通商和英军从定海撤退等。此后虽经义律多次胁迫，琦善始终不敢在草约上盖用钦差大臣关防。²⁶ 日英方便在没有任何条约或其他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出兵占领了香港岛。

1月27日，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十分恼怒，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等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000余人开赴广东。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弹劾琦善私许香港的奏折，震怒之下，又命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治罪。但林则徐、邓廷桢却依旧受到排斥。不但没有获得局部的战争指挥权，而且每当战事失利时，都要重新受到贬责，直至最后充军到新疆。

英方得到了道光帝主战并调兵遣将的情报，便先发制人，于2月下旬发动对虎门要塞的攻击。横档、靖远等炮台相继陷落，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以下400多将士壮烈殉国。随后，英军上溯珠江，继续进攻。3月18日，攻陷海珠等炮台，兵临广州城下。

参赞大臣杨芳于3月率军到达广州。其时英国有2万吨商船不能进口，又有3千万磅茶叶亟待运出。义律从商业利益出发，提出休战，得到同意。广州于3月20日恢复贸易。义律则派人赶往印度，要求印度总督增派军队及舰只来华。

4月，奕山及各省援军相继到达广州。奕山一到广州，便得出“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的结论，公然提出了“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在作战上，则希图侥幸取胜。5月21日，奕山贸然发动了一次夜袭，早已有备的英军乘势反攻，五天之内，即攻占了广州城外的全部炮台。26日，广州城上打出了白旗。第二天，被迫接受对方提出的要求。奕山交赎城费600万银元，率军退离广州。在清方赎城费大体交清后，英军也根据协定，交还各炮台，退往香港。奕山等人隐瞒了事实真相，在奏疏中谎称“粤省夷务大定”，要求撤退各省援军。7月29日，道光帝批准广东援军“凯旋”，同时谕令沿海各省酌量裁撤兵勇。

但英国方面却不愿善罢甘休。1841年4月，巴麦尊接到了义律捏造的订立所谓“穿鼻草约”的报告。这位“英国的独裁者”竟然气得暴跳如雷，当时就予以否认，并立即解除了义律在华的一

切职务。他怒斥义律违背训令，未能充分利用交由其支配的兵力，并轻易地接受了同其奉命所要争取的差得很远的条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责备义律没有从中国取得开放口岸、勒索军费商欠、攫取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并在私信中表示：要不是因为义律莫名其妙的古怪行为，英国想要的全部要求，早就到手了。

英国政府改派老资格的殖民地官员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增调援军来中国进一步扩大战争。

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为迫使清政府屈服，他决心把战火引向北方。21日，他命英军一部留守香港，自率主力北上。27日一举攻陷福建沿海重点设防的厦门。清总兵江继芸等阵亡，坐阵督战的闽浙总督颜伯焘狼狈逃走。9月6日道光帝才得知璞鼎查率兵北上的消息。13日，厦门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连忙下令沿海各省停止撤军，加强防御。9月下旬，英军主力已集结于浙江舟山洋面。10月初，英军第二次攻陷定海。守将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战死。11日，英军转攻镇海。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于兵败后自杀，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脱逃。13日，英军不战而进据宁波府城。由于受到兵力和季风等方面的限制，英军在占领宁波后，暂时停止了进一步的行动。璞鼎查本人也于1842年1月返回香港。

英军在半月之内连陷浙东三城，使清廷再次受到极大震动。为挽回浙江方面的败局，道光帝任命协办大学士、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并调派各省援军近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自10月29日出京，直到1842年2月10日（正月初一）才到达杭州。三个多月间，一路游山玩水，勒索地方。3月3日，他率军到达慈溪前线，决定于10日四更时分的所谓“四寅佳期”（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兵分三路同时反攻宁波、镇海、定海。由于并不了解敌情，准备仓促，加之实际投入攻城的兵力又过少，结果三路均遭失败。英军乘机反扑，慈溪失陷。奕经等仓皇逃回杭州，从此主张求和，不

敢再战。

军事上的连连失利，迫使道光帝更弦易张。他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带同前两江总督伊里布驰往浙江寻求谈判途径。但英国侵略者为彻底压服清政府，不使它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对耆英等人的求和活动不予理睬，而是按预定计划入侵长江下游地区。

1842年5月英军退出宁波和镇海，集中兵力于17日攻陷杭州湾北岸的海防重镇乍浦。守卫的旗兵坚决抵抗，大部壮烈牺牲。6月，英军开始进入长江。从印度派来的援军计大小舰船百余艘，陆军士兵1万多人也于此时陆续到达。16日英军突破清军重兵设防的吴淞口，陷宝山。江南提督、老将陈化成死守炮台，力竭牺牲。两江总督牛鉴仓促逃遁。接着，英军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进占上海。7月，英军放弃上海，列出强大阵势溯江西进。21日，英军以陆军近7000人的绝对优势兵力进攻镇江，但遭到了守城旗兵的殊死抵抗。城破后旗兵们仍不逃散，而是在巷战中流尽他们最后的鲜血。英军在战斗中也付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伤亡。恩格斯在评论镇江之战时，热烈赞扬了守军顽强的斗争精神，并痛责了英军的残暴行为：“驻防旗兵虽不通兵法（按：指近代战争的作战方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185人，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镇江之战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英军通过此战，达到了切断长江与运河的交通命脉，以震慑清王朝的目的。清朝方面，则彻底失去了抵抗的决心与勇气。

在这场前后断断续续打了三年的战争中，中国军队从未取胜过。这场战争，充分暴露了清朝当局在军事决策上的颠预（糊涂，

不明事理)与无能,也说明了中国既有的建立于冷兵器作战基础上的技战术和整个军事体制已根本无法适应近代化战争。

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及其后果时,曾以极为冷峻的鸟瞰笔法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然而中国人并不只是屈服于近代战争机器的淫威下任人宰割的俎上之肉。中国人民富有反抗外来侵略压迫的传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在政府对侵略者进行抵抗时曾积极支持和配合军队作战;而当统治者转向屈辱投降时,则自发地进行了保卫家园的斗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广州北郊三元里人民 1851 年 5 月底反抗英军的事件。就在奕山等人于广州战败,屈辱停战之时,英军在三元里一带奸淫掳掠,开棺辱尸,激起民众的极大愤慨。5 月 30 日,三元里等处 103 乡的数千义勇包围了观音山的英军营盘,英军出击,被引自牛栏冈一带。时值大雨,英军的燧发枪无法射击,义勇乃迫近肉搏,毙敌 5 人,伤敌 23 人。第二天,数万群众乘势层层包围了四方炮台。英军以攻城威胁清方官员。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解围,强行解散了群众队伍。手持冷兵器的民众与近代化的敌军相抗并取得了正规清军所无法取得的战绩,从而表明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中国人也绝不乏聪明才智。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已注意向西方学习。林则徐在广州时,即曾设立译馆,翻译外国书籍、报纸,了解外国的情况。当时所译的有《华事夷言》和《四洲志》等。他还请一位美国教士为他翻译了国际法中的某些简短章节。此外,若

干证据也表明 还在 1842 年的战争期间，中国人已力图对西方新技术作出迅速的反应。英军在攻陷厦门时曾发现一艘已基本完成的英式双层甲板三十炮位战舰的复制品，其他几艘类似战舰的制造工作也很上路。在吴淞，他们发现了五艘新的中国明轮战艇，装备有新式的铜铸炮。在上海，他们俘获了 16 门新的制造精良的 18 磅船用炮，从铸在炮管上的瞄准器到燧发机的穿孔火门，应有尽有。西方侵略者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近代化战争，既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凌辱，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激励。

第三节 屈辱的《南京条约》

1842 年 8 月 英舰驶抵下关 兵临南京城下。有守土之责的两江总督牛鉴在璞鼎查发出攻城的威胁时，表示愿出巨款作为南京的赎城费。伊里布和耆英则先后赶赴南京乞和。英方在确认了耆英及伊里布全权代表的身份以后，同意与他们进行谈判。但当清方对英方的要求稍有怠慢时，英方即以重新开仗相要挟。耆英等人只得表示对英方的要求“一概允准”。在下关静海寺多次举行会谈后，26 日，英方代表璞鼎查等人进入南京，正式向清方交付条约文本。在场的一位英国军官写道：

“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和语法，中国的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我们赶紧离开。”

为了使英军尽早离开，耆英提议立即签字。但英方对他们的胜利成果不愿如此草率从事。正式的签字仪式，一直到三天后的 8 月 29 日才在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舰皋华利号上隆重举行。8 月 31 日 道光帝收到耆英 26 日的奏折，极为愤恨而又极为无奈地批准了条约的所有内容。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时，一些重大问题，如关税税率、领

小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还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中英双方后来又在广东继续谈判。1843年7月，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公布施行，10月又订立了中英《虎门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中英《虎门条约》则是它的补充，主要有如下内容：

（一）割占香港。《南京条约》第三款规定：中国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香港岛从此沦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并进一步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

（二）勒索巨款。《南京条约》第四、五、六款规定：中国赔偿鸦片费6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商欠300万银元，共2100万银元。第七款规定上述赔款须在1845年前分四期还清，若逾期每年加利息5%。值得注意的是，广州赎城费600万银元和1842年8月1日前已经勒索的其他各城的赎城费均未包含在内。

（三）协定关税。《南京条约》第十款中文本规定：英国商人在通商各口“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但按英文本，该款为“中国皇帝陛下承允在各通商口岸制定一公平而正规的进出口海关税则”。1843年7月与五口通商章程同时公布的海关税则，就是根据这一条款由清方代表和英方共同协议的结果，实际上是按英国的意愿制定的。由此，英国在实践中行使了协定关税的特权。马克思在后来曾指出：中国进口税是全世界最低的；再加上中国海关既无法主动调整税率，洋货内地税又不能增加，中国海关从此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而变为便利推销外货和外人掠夺中国原料的有利工具了。

（四）开放五口。《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有权在上述各城派驻领事官员，维护其在华利益。其中，广州是原来的码头，上海是长江的门户，其他三处则是控制福建、浙江两省出海的口岸。由于条约规定英商可带同家眷在五口寄居，后来的《虎门条约》又准

许英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外人便在各通商口岸逐渐建立起租界并将其发展为侵略中国的重要堡垒。

（五）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规定：凡是中国人与英国人“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由于这一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规定，英国烟贩和其他罪犯，从此更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了。

（六）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这是一条危害中国主权特别严重的条款。从此以后，中国只要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英国都可以同样享受。后来，中美、中法条约中，都有相同的规定，使中国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

除了在南京条约第四款中提及鸦片烟价的赔偿外，鸦片本身在这几个条约中竟然只字未提。英国当然是一直希望清朝将鸦片开禁的。璞鼎查在与清朝谈判大员耆英私下会晤时，就曾提及英人希望清朝能在实物交易的基础上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样可以终止白银的漏卮。耆英答以不敢提及此事。璞鼎查则表示，他也奉命不强求此事。但大清王朝只是在形式上仍维持了严厉禁止鸦片的条款，事实上战后的鸦片走私较之战前已更为猖獗了。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首先是美国 and 法国，对英国所获取的侵略利益十分眼红。它们接踵而至，趁火打劫，又先后胁迫清政府和他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美国在对华鸦片贸易中同样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据英国东印度公司估计，1817年各国运来中国的鸦片总数是4500担，其中美国即有1900担，占42%。1839年林则徐所缴获的鸦片中，也有1500多箱是出自美国人之手。中英贸易断绝后，美商帮助英商继续进行对华贸易。美国人把大量英国船只转移到自己的名义下从事走私偷运。后来义律说：英国女王要向美国人道谢，英商已把他们所有的货物运进，并且运出了足够的丝、茶。战争

期间，美国也曾派出舰队到中国为英军声援。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总统泰勒于 1843 年以合众国及其不可忽视的对华贸易界的名义，派遣顾盛作为专使来华。顾盛于 1844 年 2 月到达澳门后，立即施展出狡猾手段，表示坚决不与广州地方官谈判，非到北京去见皇帝不可。清朝官员不答应，他就公然以战争相威胁，说拒绝接待使节，是战争的正当理由。7 月，清政府被迫派耆英与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在这一条约中，美国取得了英国已经取得的一切特权，并且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还正式规定中国变更关税税则要与美国领事共同商定，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以及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特权。这些都比中英《南京条约》更进一步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顾盛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激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门户。现在，英国及其他国家也要感激美国，因为美国把中国的门户打开得更大了。

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不久，法国也派专使拉萼尼来中国进行讹诈。1844 年 10 月，耆英与拉萼尼在广州附近的黄埔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这一条约的模式和中美《望厦条约》很接近。主要增加的部分是：规定在遇到麻烦时，倘若法国领事不在，法国国民得向任何友好国家之领事上诉；以及比顾盛更使劲地重新强调了治外法权的原则：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犯罪案件，得根据其本国法律审判的权利。耆英屈服于法国人的压力，从皇帝那里得到命令，准许天主教信教自由并撤消了雍正帝反对教会的敕令。在 1845 年的一份补充文告中，耆英又将此权利扩展到基督教徒。

英国人根本无须为美、法及其他类似的纷至沓来的谈判担忧。因为中国人所提供的任何新特许，他们全都有份。清朝方面当初之所以同意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只是想减轻英方对自己的压力，不料却紧紧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这一条款有效地防止了